

精神的田园

东方之子访谈录·文化学人卷

主编 时 间 张光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神的田园:东方之子访谈录:文化学人卷/时间主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

ISBN 7-5080-1800-1

I.精… II.时… III.人物-访问记-中国-现代
IV.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6463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

出版者: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印刷者:北京房山区先锋印刷厂印刷

经销者: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开本

字数:256千字

版次:2000年1月北京第1版

印次:200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7-5080-1800-1/Z·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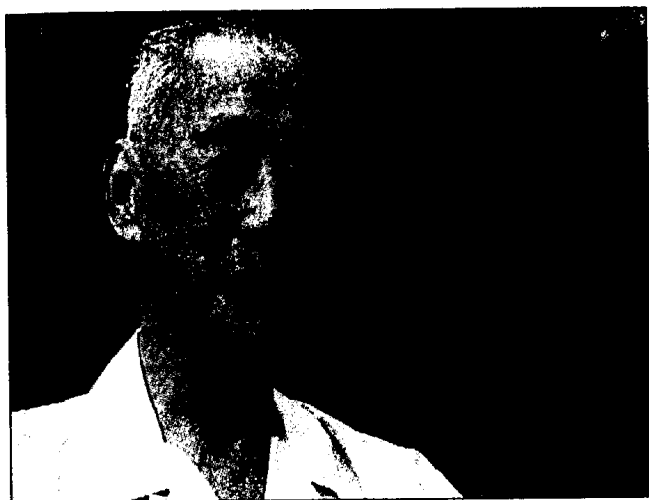
定价:19.80元

目 录

陈岱孙	1	余 华	87
郑成思	8	黄传会	93
戴锦华	13	蔡若虹	99
赵鑫珊	19	陆学艺	104
冰 心	24	李 琮	110
史铁生	28	方克立	115
吴敬琏	38	李学勤	121
厉以宁	46	杨 义	127
邬沧萍	55	刘国光	133
王诗成	63	刘以鬯	139
冯骥才	68	舒 乙	144
陈 村	78	贾兰坡	150

董辅弼	155	周国平	235
饶宗颐	161	王缉思	241
龙应台	167	高培勇	253
唐浩明	172	胡祖六	259
铁 凝	177	冯其庸	265
张维迎	182	刘斯奋	269
王炳华	192	柏 杨	275
穆 青	198	陈忠实	280
林 庚	203	毕淑敏	288
芮 沐	212	戴 舟	298
陈平原	217	二月河	303
赵汀阳	223	金 庸	308
葛剑雄	229	资华筠	322
附 录			1

播出日期:1995年9月27日~28日



陈岱孙

经济学家、北
京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我是1900年出生的,我年轻的时候,也就是十几岁时恰逢五四运动,可以说是五四青年。当时的青年对我们的国家有一种共同的担忧,很怕有朝一日这个国家被列强瓜分了。21世纪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在国际问题上讲话是算数的。我对我们的青年一代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同时也将告诉他们有许多的工作需要他们去做。21世纪是他们的世纪,但是除了作为世纪的主人之外,还要担负起主人的责任。

——陈岱孙

在我国经济界和教育界,陈岱孙几十年来一直受到广泛的尊重和爱戴。早在 20 年代,他作为我国最早的一批留美学生,获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他当时的同学中,有人后来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而他回到了祖国,献身教育近 70 年,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经济学家。今年他 95 岁,这个学期他的又一个博士研究生学成毕业了。

解说:陈岱孙原名陈忠,1900 年出生于福建省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留美回国后,27 岁起担任清华大学、西安人大和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和教育界领导,他是最早把西方经济学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之一。

主持人:岱老,新的世纪就要到来了,您是 20 世纪的同龄人,我想,当您回顾这 95 年的历程,您一定有自己的感慨和思考。

陈岱孙:我是 1900 年出生的,我年轻的时候,也就是十几岁时恰逢五四运动,可以说是五四青年。当时的青年对我们的国家有一种共同的担忧,很怕有朝一日这个国家被列强瓜分了。21 世纪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在国际问题上讲话是算数的。以前我也参加过国际会议,我们都是带着耳朵去的,用不着发言,人家也不要你发言。我对我们的青年一代寄予了很

大的希望,同时也将告诉他们有许多的工作需要他们去做。21 世纪是他们的世纪,但是除了作为世纪的主人之外,还要担负起主人的责任。

主持人:您是在五四新文化背景下走出国门到美国去求学的,“五四”运动有两面旗帜:科学和民主。您是处于什么考虑选择学习经济学的?

陈岱孙:那个时候,已经有人感觉到科学救国最重要。我当年也感觉到科学救国很重要,当时我有一个自身条件问题,数学不好,所以,搞科学的条件不行。中国古书上面曾经讲过“逐师逐兵”,我也感觉到国家要强大起来,经济的强大和经济的进步是一个重要条件。我就是这样决定去学经济学的。

主持人:中国学生到国外去进行中国问题的研究,回到国内再做国外问题的研究。您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的时候,做的博士论文是关于马塞诸塞州地方财政与人口密度的关系,这是很地道的美国题目。我想,它的难度和工作量是很大的,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呢?

陈岱孙:两个原因。一个是哈佛大学不需要外国的学生选你本国的题目,这样一来做导师的因为不了解他国国情而无法进行指导。第二个,我的导师布拉教授在当时是很出名的一个教授,我很想得到他的各种帮助。我也做了一个关于中国的题目,但他根本不认识中国字,所以我还是挑选了一个外国的题目。

解说:作为爱国知识分子,1945 年秋,在蒋介石企图发动内战的严重时刻,陈岱孙和张奚若、闻一多、朱自清教授一起发表了著名的 10 教授公开信。今天,作为全国政协常委,陈岱孙仍然参与大量的社会活动。

主持人:岱老,在美国您学的是财政经营学,回到国内来您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去从政,而是选择了教育。您这样做

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陈岱孙：一开始也许是偶然的，到后来变得主观了。我在军阀时代看到过那时候的政治，也看见过国民党那时候的政治，我看了两三年之后就感觉到我不是一个材料，我不会做官，恐怕只能教书了。因此就想满足当教师的愿望。又过了几年我的心就定下来了，还是教书吧。到现在我并没有后悔，我认为自己的选择还是对的。

主持人：您从事教育已经快 70 年了，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才。对您个人来讲，做教育工作 70 年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收获？

陈岱孙：教育本身最怕有误区。看到年轻的人过几年之后成熟起来了，我自己心里真的觉得很有紧迫感。就是在学校里我也感觉到古人说过的一句话很对，“教学相长”。你可以教学生，但学生有时候也可以教你。因为有时同学给你提问、请教你的问题，你当初可能自己没有想过，他却给你提出来了……我遇见这种事是很多很多的。

主持人：教育工作本身对您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影响呢？

陈岱孙：比如，在学生提出问题之前我自己没想过，因为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因此就想在这一方面做一点点研究工作。

*

*

凡是听过陈先生讲课的人都知道，他讲课深入浅出，复杂的经济学远离深奥的理论而变得浅显易懂了，而且，每堂课他讲完最后一句话时正好响起下课的铃声。

和研究着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最前沿的问题。

*

*

解 说:最近几年,有很多年轻学者到西方去学习现代经济学,并且陆续回国工作。作为我国最早的一批留学西方的经济学博士,陈岱孙一直认为,经济学不是空泛的理论,它是智用之学,经济学的运用重在于理论。这些类似老生常谈的话,包含了他很多年来的一些人生体会。

主持人:您一直倡导在经济学理论中应该理论联系实际,您能不能具体讲一讲如何实现理论联系实际?

陈岱孙:我自己有一点体会。从国外带回来的有关西方的理论,未必适合于中国的实际,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是:有些人非常推崇对西方很有效用的理论,于是就拿来套中国的实际,不加选择地加以引用。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对的,都是理论不联系实际。我觉得,我们中国有我们中国特殊的情况,我们对于人家已经总结出来的理论,不管它在英国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我们都要挖掘它有生命力的部分,并且将这种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也就是说,要能够有选择地进行取舍。

主持人:您是国内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在您看来,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

陈岱孙:过去我在几个场合里曾经发表过谬论,我说,过去我们有一段时间盲目地排斥西方经济,因为有的人认为,西方经济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那种认识是错的。当时,我们如果能将西方经济学中有利于中国发展的部分利用起来,那将是为了不得的。接受它,要把它本土化。第一,要好好了解经济学的本质是什么。第二,我们要了解国内的情况,要把两方面结合起来。

主持人:岱老,现在国内关于通货膨胀的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我知道,在30年代的时候您对通货膨胀就有深入的研究,关于通货膨胀的观点您到今天还没有变吗?

陈岱孙:我还是那样的看法。通货膨胀就是一种变相的赋税,变相的税,而且是变相的坏的税。为什么是坏税呢?因为这个是不公平的税,能够纳税的人、有能力纳税的人并没有纳税,我们没能力纳税的人反而纳税了。

主持人:应该怎么对待今天国内的通货膨胀呢?

陈岱孙:有人只以为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的问题,其实,它不是简单的货币问题,它是一个经济制度的问题。既然是整个经济的问题,那么就要正确对待。

主持人:岱老,我发现您的文集中从1969年一直到1989年整整20年没有留下您的任何思想痕迹,我们为此非常惋惜。您怎么看这一段历史呢?

陈岱孙:我的看法很简单,那个时候我写文章也发表不了,何必写文章呢?这是一个原因。第二,老实说,我对文章并不很热心,因为我曾经想写大文章,但是结果很不幸,大文章没写成,就打散了。

主持人:可是在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以来,您还是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啊。

陈岱孙:那些都是论述,心血来潮也写一些文章。那些不是计划的产物,是心血来潮的产物。

解 说:1978年以来,欣逢盛世,陈岱孙重新焕发出科学的青春,他以80岁的高龄发表了研究多年的专著,撰写了《从古代学派到马克思》,主编了两卷本的《政治经济史》,撰写了各类文章,累计100万字。为了普及现代经济学知识,他多次组织了校内外经济学系列讲座。他还利用很多时间为中青年学者著书撰写序文,为各方求学者复信。看到年轻人求实好学,陈岱孙表现了

提携后学的极大热情。

主持人：岱老，您出身书香门第，受过很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我想，琴棋书画在您这儿一定很内行了？

陈岱孙：这倒不是。关于琴棋书画我没有一行是懂的。要讲体育算武，我是武什么都参加了，什么都不好，排球篮球我都打，蹦跳、骑马、爬山、打猎……我全来。

主持人：岱老，我们曾经听说过一些关于您生活上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这么多年来您一直为许许多多的人所尊敬和爱戴，可是为什么您一直是一个人生活呢？

陈岱孙：我觉得，婚嫁问题是可遇不可急、可遇不可求的。有机会碰到了，你就能够……你要碰不到就不可能发生，我的情况是没碰到，没碰到自然也就没有发生。我年轻时在清华大学教书，刚刚开始工作时挺忙的，后来抗战爆发了，饭都吃不上了，还讲这个问题吗？后来没有遇见适当的对象，当然也不会发生婚嫁的事了。

主持人：岱老，在结束今天采访的时候，记得1995年10月20日是您95岁的生日，看到您现在精神还这么好，还在每天工作，还在指导博士生的学习，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祝您健康长寿，和我们一起迎接新世纪的来临。

陈岱孙：谢谢。

主持人：邵滨鸿 编辑：王宝军

//

播出日期:1995 年 10 月 4 日



郑成思
中国社会科
学院知识产
权中心主任

因为我觉得,知识产权这个东西对我们国家来说太重要了。我们不但要研究它,而且我们研究的档次要在国际水平上,不仅仅要在国内领先,还要在国际上领先。

——郑成思

前不久,我们走访了我国著名的知识产权专家郑成思教授。他对我说,作为专门研究知识产权的人,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对精神产品的侵犯。因为这不先是道德的沦丧,也是对人类科学和文明的亵渎。对这类行为的尚不正确的认识,是今天知识产权屡遭侵犯的重要原因之一。

解说:1994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成立。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机构,它除了给中央提供知识产权保护的具体建议外,还为国家立法、司法以及行政主管机关提供咨询。从事该项研究多年的郑成思,成为这个中心的第一任主任。

主持人:在法学领域里面有那么多的研究专题,您选择了知识产权问题来研究,是不是有它的偶然性?

郑成思:很偶然。1979年第一次中美贸易谈判的时候,美国就硬要在里边加一个知识产权的条款,说是如果没有这个条款的话,美国总统不签字。但是中国没有人懂什么叫知识产权,要在一个条约里边签一条我们没有人懂的东西,那对中国是相当危险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这个问题非研究不可。

主持人:这十几年来,您在知识产权立法、普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写了十几部书和很多论文,是不是都是在这么一种紧迫感下创作出来的?

郑成思:我觉得,知识产权这个东西对我们国家来说太重要了。我们不但要研究它,而且我们研究的档次要在国际水平上,不仅仅要在国内领先,还要在国际上领先。紧迫感就在这里,总感到有东西推着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不断深入。

主持人:从知识产权立法工作方面看,十几年前,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基本上是空白,我们用十几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了几百年的时间走过的历程。作为一个法学家,能赶上这样一个通过自己的研究来填补法律空白的时代,您应该是很幸运的。

郑成思:对,我觉得很幸运。我们是四大发明的原始国,但是这么长时间没有专利没有保护,在版权领域甚至有“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你抄得高不高”这么一个口头语。现在有人就是这样,你要诉讼他侵权,他就说,“天下文章一大抄”,世世代代这么抄下来的,怎么抄到我这一代成了侵权了?我说到你这一代有法了,所以你就侵权了,这是一点不错的。

还有很多人就是不了解有形物和无形物之间的区别。他认为,他买了一盘磁带,买了一个软盘,他就可以拷贝,他觉得这东西是他买的。他却没想到,这个拷贝权利是人家的。就是说复制权是人家作者的,不是你的,它和有形物质是分开的。像这些东西,国内很多人都不了解。我就觉得首先应该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什么叫知识产权,才谈得上尊重知识产权,才谈得上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然后国家才可能发展。

解说:郑成思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1981年被派往国外进行知识产权的研究和交流工作。他多次以法律顾问身份参加了中美知识产权及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从1981年到现在,他参与起草了《中国著作权法》和《计算机保护条

例),参与了《专利法》的修订工作,撰写并出版了《版权法》、《中国智力产权》等24部著作,发表了300多篇论文,成为中国在这一领域走在最前面的人。

郑成思:我的一个最大的愿望还是在知识产权研究方面站在国际的前列,就是要永远站在国际的前列,不退回来。给我们国家提供咨询,使我们国家在国际谈判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国内的立法中,要尽量地减少纰漏,减少缺陷。

主持人:十几年前,我国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是一片空白,通过十几年的工作,很多法律都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在执法过程中却有很多不尽人意的事情发生,对这个事情您怎么看?

郑成思:这主要是个普法的问题。从大多数的执法人员以及大多数的公众来讲,对于版权、专利权、商标权这些权利还不是很了解,执法人员中可以说有一部分人是了解了,而且了解得相当透彻。但是,大部分人是刚刚接触这个东西。怎么样执法?怎么样才更合理?什么叫侵权?在有些时候界线不是太好划分的。作为一般老百姓和某些执法人员,就像我刚才讲的,对有形物和无形财产权他分不清,尤其是对无形的知识产权分不清。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要提高执法力度的话,首先一个是普法的问题。

主持人:您现在所做的工作是如何用法律保护知识成果,但是同时,您自己这份工作,也就是您的智力成果却在被别人抄袭。面对这样的事情,您有很多次都不是通过诉讼来解决的?为什么会是这样?

郑成思:有的我诉诸法律了,曾经提出过起诉,但是大多数被我指为侵权的后来都认了错。我觉得,我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求经济赔偿,当然经济赔偿是我应该得到的民

事权利。他们只要认识到了这叫侵权,以后就不会这样做了。这对社会还是有好处的,特别是年轻人。你不能把人家追究起来没完,人家犯一次错误不能一辈子都过不下去了。

主持人:现在,国内有一些人,甚至一些名人,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了一些侵权的行为,这可能是你们在普法工作中应该特别注意的一项工作,是吗?

郑成思:我觉得不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太严重。当然整个来说,侵权不是好事,但是有时候我不知道这是侵权,现在人家告诉你,你知道了,知道了怎么办呢?承认了错误就完了,下次不这么做了。在那些有版权、有知识产权制度多年的国家,也经常发生这种事情。比如像马克·吐温,他写小说写得那么好,因为他过去背下来很多名人的小说,他写的时候就当成自己的思路写下来了,后来人家告诉他,说你抄了我的东西。他一核对确实抄了别人的东西,马上登报声明,这在马克·吐温一点也不丢面子,他还是举世无双的文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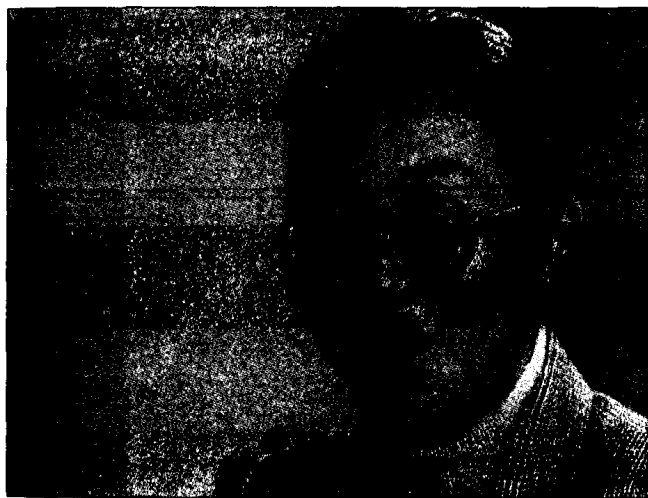
主持人:您过去都是义务服务,现在这个中心是不是要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则来做事了?

郑成思:从两方面说。一个,我们成立这个中心,批文上就不允许我们办成一个盈利性组织。另一个,我们愿意干,为什么?因为它是在给整个国家,给整个时代填补这个空白。这对于我们国家能留住更多的知识分子和发挥更多的知识分子的作用,我觉得有相当大的贡献。

解 说:知识产权宏大的空间,使郑成思成为甘愿为此“衣带渐宽终不悔”的人。他执著地认为,在任何领域,中国都应该争取站在世界的前列。

主持人:邵滨鸿 编辑:王宝军

播出日期:1995年12月24日



戴锦华
电影评论家

中国电影的变化带来发展,在这样一个非常的、特定的电影环境和电影文化当中,中国电影迎来了新时期。

——戴锦华